

Column

■大周

要廉洁官员 更要廉价政府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官多扰民”。如果说延安时代的“精兵简政”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成功,那末现代中国的“精官简政”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举措。政府改革必须从“精官简政”做起,还人民一个“廉价政府”。

“吃皇粮”的人太多,行政机构过于庞大,会生出种种弊端,譬如形式主义的“套话”人人深恶痛绝,可是“套话”仍然处处不绝;官僚主义的“冗员”个个大呼小叫,但是“冗员”仍然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就在于机构庞大。机构为什么会庞大?原因又在于政府不“廉价”。而政府之所以不“廉价”,根本

原因又在于缺乏纳税人的“成本-效率”预算约束。简单说,几十年机构改革为何始终未能走出“放权-收权”的怪圈,且越改越臃肿,越改越庞大,反腐倡廉、勤政高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三令五申却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一点儿也不用于其“大”而承担任何经济责任。

实际上,确立市场机制与政府转变作用,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改革,便是要做到这两个相反相成的“面”同步、协调。作为“下岗失地”的均衡机制,行政机关“缩编”早已势在必行,是政府机构“提高效率”的现实抉择。

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要求行政制度、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28年的改革历程表明,“改”到深处是产权(物权)。简而言之,无论个人、集体还是政府,都必须承担行使财产所有权职能所产生的责任、义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之所以过大开销过大效率过低,就因政府对属于“全民”的财产关系不清

或产权不明晰,这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喂养”了一个“高价政府”。

改革之“攻坚”,实质是要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其所以为“攻坚”,无非是因为其中的艰难和风险。但为什么说“廉价政府”不说是“廉洁政府”?一则源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相关思想,二是基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相对于“廉洁”,“廉价”更朴实、直观,更大众化,寓意更深刻、丰富,更富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

“廉洁”,即为官清白,不贪污不受贿,办事节俭,不铺张不浪费;其评价对象虽然可以是政府,但主要还是政府官员。

“廉价”,除了“廉洁”的基本内涵,它更突出了政府作为“公用品”加给社会的成本应该最小化的要求;其评价对象虽然可以是政府官员,但主要是政府。

“廉洁”,突出的是政府或官员

的外在形象,而“廉价”却特别强调作为人民自己的政府即“人民政府”的内在本质(比如实现从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

相较发达国家,国内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我国行政机构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也许不能算高。然而,把由行政从业人员组成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是惊人的。我国每年新增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了“吃饭”上就足以证明,机构过于庞大不仅已经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负担,而且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或者反过来说,“大政府”与“廉洁”可以相容,但“大政府”与“廉价”却不相容。

政府机构的急剧扩张,严重侵蚀了社会财富中本应用于社会生产和发展的份额。公共品的短缺,科教之不振,部分地区和人群长期不能脱贫,“三农问题”沉痾积弊,等等,过大的行政开支严重挤占了社会的生产和发展资金,无论如何都是主要和重要原因。

政府机构的庞大还产生了一

系列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公众切齿的“三乱”即为其典型表现。并且,层层重叠的管理体制是要讲“对口”:上级有什么机构,下级也就要有什么机构;公司企业的机构设置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政府机构的延伸……此类非生产性费用非发展费用有多大?难以计算。

政府机构的庞大、重叠,还导致“交易费用”激增。条块分割的闭塞,部门林立的关卡,手续繁冗的审批,“跑‘部’‘钱’进”的“竞争”,沟通关系的“联络”……这里又会有多少无法统计、无法估量的“灰色”或“黑色”开销?

可见,针对官员个人,可以也必须强调“廉洁”;然而,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过分庞大、效率低下及其加给社会的巨大负担(腐败也与此密不可分),对政府则显然应该特别强调“廉价”。

人民政府人民“喂”,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这种服务也是有代价的,需要计算成本-效率。若无“廉价政府”,即无“和谐社会”。人民需要“廉洁”的,并因此是德才兼备的官员,但更需要“廉价”的、更有效率的文化

■生活财思

超低价旅游的双重扭曲



◎林采宜
中国银联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专家委员会委员

当人们不再被衣食住行所困扰的时候,旅游逐渐成为时尚。旅游从奢侈消费走向大众消费,固然跟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关,更重要的是和它日益趋近大众消费水平的低价格相关。从上海到九寨沟,黄龙双飞五日,成人价格是3260元,来回机票加机场建设费、燃油费是2000元,九寨沟、黄龙的门票、巴士票总价为510元,四天的含早餐住宿,以三星级酒店的标准,住宿成本大约在600至700元之间,每个游客的团费扣除上述硬性成本,最多只剩50至150元,而当地旅行社把客人从机场接出来,到将这个团送走,投入的全程陪同时间大约96个小时,整整四天四夜,大巴的油耗、司机、导游的工资、住宿成本、旅行社的经营管理成本等全部开销即使再低,摊到每个游客头上也不只这个数,何况旅行社不是慈善机构,上海负责销售的旅行社要赚取利润,四川负责接待导游的当地旅行社也要赚取利润,那么,这些利润从何而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游客在团费上“省了钱”,当然得在别的地方付出代价。

代价之一:在价昂质次的“自费”项目中为导游司机贡献收入。在不起眼处,有意无意地安插一些不具备吸引力的自费项目,或者导游在游览过程中热情推荐某些说明书上没有写明的游乐自费,在团费里该掏而没有掏的钱,自主不自主地花在“自费”项目上。

代价之二:在旅游购物中为商店创造额外利润,用以补贴团友们的“免费午餐”。大部分旅游定点商店要向旅行社或导游支付入店人头费,无论客人买不买东西,进入一个游客商店必须付若干元“人头费”给旅行社,那么买东西的游客的人头费,自然形成商店的“亏损”,这部分亏损仍然通过交叉补贴来平衡,补贴的来源是商品销售形成的利润。因此,在旅游景点购物,商品价格里不仅包括商店支付给导游的销售佣金,同时也包括商店为不购物游客支付的人头费,依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无非是出在这头羊身上还是那头羊身上而已。

代价之三:花钱买罪受。即使是既不参加自费项目,也不购买商品,的游客,一样付出代

价。早出晚归,把大量的宝贵时光耗费在等候团友购物或陪同团友自费游乐上。在旅程逗留的时间和旅行社的成本成正比,因此,旅行社和导游绝不允许游客延长逗留时间,那么用以自费项目和消费购物的时间只能挤占正常的休息时间以及含在团费里的非自费项目。当然还有伙食,廉价的团费相对应的当然是劣质的餐饮和服务。

另外,最便宜的航班多半是红眼航班,以及乘坐之后就必须红眼旅游的“航班”。还有一种是起降时间虽不“红眼”,但乘坐该航班的旅客就必须熬夜旅游的航班。例如九寨沟五日游的第一天,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从上海起飞,八点半降落成都双流机场,晚上九点半开始“成都一日游”,第二天早上七点出发,不熬夜怎么?第五日回上海,订的是晚上九点二十分的飞机,即便准点起飞,准点到达,抵临浦东机场也是子夜凌晨之间的事了,典型的红眼航班,红着眼来,红着眼去,来来去去都为一个原因——便宜。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在成本归属原则不能正常执行的情况下,交叉补贴带来的价格是价格的扭曲和资源分配的扭曲。而一日之内2000多个旅游团、三万多人同时进入九寨沟,会给这个世界的自然保护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早在四十年前,欧佩克组织就想到用限量开采石油来维护油价,提高工业化国家消耗石油的成本,阻止人类整体对石油——这一有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而四十年后,中国的旅行社却在以低价为诱饵,吸引着过量的人群蜂拥一样涌进九寨沟、黄龙,涌进西藏、新疆喀纳斯等这些绝无仅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区。

在超低价的团费竞争中,只有一个赢家,就是把大量游客“卖给”导游司机的旅行社。受伤的不仅是旅客、导游、司机,还有弥足珍贵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产。大自然用数万年的时间精心打造的绝品被商业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人类遗留在时光里的几千年文化珍稀被廉价出售。几百年后,子孙遗憾地打量着被我们的功利欲望蚕食得遍体鳞伤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时,会说什么?

没有群体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游历过的国家中,对待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态度最为相似的国家当属埃及和中国,当古埃及的文物、九寨沟的山水被拥有它的子孙们“吃”得只剩下一堆残骸和记忆时,终于有人会知道,拿金钱买不回的东西去换钱是多么的愚蠢和罪过。

■彼岸

老爸攻电子 儿女学医考律师

据美国有关机构前不久对各族裔经济状况所做的统计,美国亚裔(包括华裔)在平均家庭年收入上已经超过白人家庭。

这个统计结果,从表面上看,华人在教育上的投入以及职业的选择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早几年华裔第一代移民大多选择攻读电脑软件或电子工程专业,并非是他们都有技术背景,在来美以前的专业与信息技术毫无关系。比如,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是学政治专业的,他现在已经是有多年经验的高级电脑编程人员了,我还认识国内来的主任医师,也转学了电脑,现在每天对着的不是病人,却是电脑屏幕。

如此多的华人移民从事信息技术行业,是因为生活所迫,这些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好找,且起薪不低。许多华人移民来美国后,花一年多时间读一个电脑硕士学位,继而找到工作,就开始脱产,工作两三年就在市郊买一所房子,基本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在本世纪初的那场美国经济衰退之中,一些华人也受到冲击,但随这两年美国经济的回升,失业的也都重新就业,保持了中产阶层的位置。

而华人移民的第二代大多就不再进入工程、技术行业了,许多人学商业、学法律,更热门的是学医。虽然他们也并非对当医生有那么大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被迫的因素,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父母之逼,因为在美国当医生,职业非常稳定而且收入偏高。

可从本质上讲,华人家庭能够在美国社会很快脱贫致富,并在年平均收入上超过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是华人移民充分利用了美国社会所提供的相对公平的机会,并借助了华人文化的一些传统优势。毋庸置疑,当今美国社会仍然有种族歧视,但那样的歧视远不能阻止任何族裔去获得比较公平的机会。华裔并没有去抱怨历史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并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没有去要求得到某种程度的优待。在美国至今仍然对少数民族执行优待的民权法案,在大学录取中,少数族裔比如黑人能以更低的分获得录取,但华裔学生在大学录取等方面非但得不到任何优惠,相反,由于平均成绩更优秀,他们面对着更加严格的录取要求。因此,华裔学生学习更加刻苦,也珍惜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虽然近年来有更多的华人开始从政,也有华人出任州长,但与美国大众相比,华人仍然是不关心政治的群体,在投票率上,华人明显低于其他族裔。在朋友之间的闲聊中,许多华人也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热情,比如许多华人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他们不会在周末去参加反战游行,也许送孩子去上钢琴课比反战更加重要。华人

■万象

“到底是谁在统治英国?”

——英伦手记之七

老友问我:据说当今英国“蓝领”、“工人阶级”非常吃香,何以如此?那时我初抵伦敦,想当然地回答说:现在不正是蓝领出身的“工党”当权吗?工党领袖布莱尔已连任了两周首相(至今已第三任),狐假虎威嘛。

如今想起当初的回答,实在只是蜻蜓点水。英国是个复杂、有趣的“对立统一”体,很难“非此即彼”而论。君不见,这厢的皇族贵族依然故我,那边的民主竞选政党交替;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此起彼伏;为“劳动阶级”壮大队伍,也为“社会主义”埋下伏笔。

当然,英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是泛经济化的,指的是一种以中下阶层人民福祉为重的国家福利机制,与中国人、美国人泛政治化的“社会主义”有较大差别。正因如此,英国人很少将“社会主义”、“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而宽厚地给予自由空间,而英国共产党本身也趋向温和,时不时与工会、工党甚至保守党合作,参加选举,有的党员被选作国会议员。

不知是英国发展的特殊土壤,还是马克思、恩科斯的前世功德,反正社会主义一直与英伦三岛发生着很深的纠葛。在经历了撒

切尔主义和布莱尔“新工党”政策后,这种色彩黯淡了下来。

十八世纪末肇端的工业革命,以劳动密集型为开端。一方面,是初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和贪婪,另一方面,是被剥削、生活贫困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1844年,英国曼切斯特特利料父亲棉花厂生意的恩格斯为这里的境况所震惊,写下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无疑,当时英国的社会是发端社会主义的温床。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英国工业革命在走向顶端后,开始下坡,社会贫富差别扩大,劳资关系紧张,自由罢工连续不断,有组织的大规模罢工出现了,各种大小工会更如雨后春笋。1868年,一个将全英各重要工会联合起来的“工会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组织宣告成立,它的社会主义倾向几乎与生俱来。通过参选,进入国会,工会对政府立法和决策的影响甚大,成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般特殊的力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总人口约为5000万,而“工会大会”拥有会员便达1200多万人,它的领导人随意进出“唐宁街十号”,和首相大臣们喝咖啡、嚼三明治、谈国事。1974年,保守党领袖希思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不关心政治有其文化传统的原因,更因为华裔认为白人等族裔尽可以去进行政治斗争,不管哪一个党派执政,而华裔自己只要抓住机会,重视教育、刻苦用功,都能够获得不错的事业和好的生活。

此外,美国所有族裔中,华裔家庭最为稳固,离婚最少。许多华裔家庭都是两人上班,这自然增加了家庭年收入,也能够帮助华裔家庭在教育等投资上多投入。谁都知道医生、律师是不错的职业,但也是在教育上要求很高投入的职业,许多华裔家庭愿意在孩子的教育上多投入,也有能力投入。与华裔比较稳定的双薪家庭比起来,美国那千万以上的单亲家庭当然就是更加艰难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有相对公平的制度,以自己的才智和刻苦,再加上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华人就能够获得成功并超过其他族裔?结论似乎就是这样,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公平的社会制度。不能说华裔对美国的制度没有贡献,但仅从这一点上讲,华裔的对白人族裔有不小的欠账。



◎陈丹红
自由撰稿人,旅居美、英10余年

首相在继任大演讲中忍不住问道:“到底是谁在统治英国?”(工会:还是政府?)最后,他败给了工会背景的工党候选人。

英国工会呼风唤雨的大能足以安慰马克思、恩格斯的天在之灵,也让我这个旅居英国的外人跌破眼镜。2003年冬,一场消防队员大罢工波及全美,工会要求加薪40%,政府只给4%,谈判屡屡不成,原定48小时的罢工延至又延。那几天外出,四处可见消防站外的罢工横幅,消防队员们围着特别点燃的篝火,喝着咖啡取暖,吸引公众注意。晚上回家见BBC电视台新闻播报一场邻里大火,消防队因罢工见火不救,首相布莱尔紧急调动军队出动灭火。2004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伦敦市政府向市民发出警告,地铁工会要在节日期间发动罢工。工会提早一天宣布圣诞节前夕晚六点开始罢工。那天下午3点,伦敦地铁站已被提早下班的人潮堵塞。巴士稀缺,出租车供不应求,我先生加入了不断增长的前锋行列,步行四个站到了滑铁卢总站回家。他说,周围的英国人抱怨的只是“工会选错了日子”,对罢工本身却熟视无睹,满不在乎。



蒋玉磊 制图

■看东说西

从韩国新都名 说到重构龙

12月21日,以韩国政府国务总理韩明淑为委员长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推进委员会,决定将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Sejong)。

中国把汉城译为首尔,已历时1年多。韩国的官方说法是,随着两国交流的增多,名称造成的混乱越来越多,因而要求中国官方对其首都的翻译,由首尔替代汉城。首尔中的“首”,可解释为首等、一流。“尔”是句末语气助词,且为汉语翻译外国地名的常用字。朝鲜太祖四年(1395年),太祖李成桂将王都“汉阳”更名为“汉城”。日本明治四十二年(1910年),改称“京城”。大韩民国二十七年(1945年)起,恢复原名。现名系据韩语“汉城”的英语音译“Seoul”,再翻译回韩语,正字由“汉城”变成“首尔”。坊间的说法是,韩国并不愿意其首都名称与中国主体民族名称接近。在韩国只要要求中国对其首都都有翻译要求,而对釜山等中文翻译并无异议看,传言倒也有些可信。

世宗李洵是朝鲜,韩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朝鲜太宗十八年(1418年)即位。他精通儒学。他最杰出的成就,是召集郑麟趾等学者,创立朝鲜文(韩文)字母,并于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颁布《训民正音》。当然,此后的官方书面语言仍然是中文。因此,仅就朝鲜民族的文字形成而言,世宗李洵有些像朝鲜半岛上的仓颉。

不过,世宗这样的庙号,并非仅在朝鲜半岛才有。中国就有10多位世宗,还不包括历代追谥的庙号。韩国不乏汉学家,也知道汉文化圈国家的世宗超过一个班。但与弘扬本国文化比,其他国家是否有世宗,已不重要。这虽与首都的中文译名要求“去汉化”的嫌疑形成强烈对照,但并不难理解。作为君主,世宗李洵对民族文化建设确实有杰出贡献。韩国把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反映出它已把重视文化摆在了首位。

重视本国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要素。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种形态。因此,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曾说:“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谁。”就对民族文化重视程度而言,韩国的做法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龙,英文dragon,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因而“构塑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牵头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提出,在对外宣传和传播时,可以注意挖掘诸如“龙凤呈祥”、“龙王送雨”、“龙飞凤舞”等和谐元素,使龙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这一观点一旦被采纳,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对龙作重新解释和包装。

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说法,缺乏依据。《龙的传人》歌词中有:“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但这只是小曲而已。《辞海》对“龙”的解释是:一、“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麟角须爪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二、“封建时代用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如:龙须,凤子龙孙。”从《辞海》的解释看,龙以“兴云作雨”见长,并有一些外表特征。实际上,龙、凤、麒麟等均起源于上古传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其中,龙与凤均可作为帝王的象征。称百姓为龙的传人,与帝王平起平坐,这在旧时绝对不允许。因而,自称龙的传人并非中国的传统。今天的中国并非君主制国家,因而以龙为国家形象的说法,也很牵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误解龙,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介绍不够,让小曲替代了传统文明。吴友富的建议,对龙的形象新包装,充其量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而已。

想要中国资本市场提高国际地位,不能忘记文化的作用。仅仅强调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肯定是不全面的。国际上已经有了,你再重复建设,充其量也只能以规模取胜而已。中国目前取得的经济成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结的硕果。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扩大,最终要依赖自身独有的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参与主体,整体上由国有资本控股。在境内市场,我们让上市公司统一面值、会计年度等,均可看作资本市场中的中国文化。现在有一些人,一谈到国有控股就摇头。但从H股影响与日俱增看,境外投资者完全能够接受中国的经济文化。笔者相信,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作用,其中包括传统文明的精髓。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牵头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提出,在对外宣传和传播时,可以注意挖掘诸如“龙凤呈祥”、“龙王送雨”、“龙飞凤舞”等和谐元素,使龙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这一观点一旦被采纳,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对龙作重新解释和包装。

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说法,缺乏依据。《龙的传人》歌词中有:“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但这只是小曲而已。《辞海》对“龙”的解释是:一、“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麟角须爪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二、“封建时代用龙作为皇帝的象征。如:龙须,凤子龙孙。”从《辞海》的解释看,龙以“兴云作雨”见长,并有一些外表特征。实际上,龙、凤、麒麟等均起源于上古传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礼记·礼运》)其中,龙与凤均可作为帝王的象征。称百姓为龙的传人,与帝王平起平坐,这在旧时绝对不允许。因而,自称龙的传人并非中国的传统。今天的中国并非君主制国家,因而以龙为国家形象的说法,也很牵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误解龙,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介绍不够,让小曲替代了传统文明。吴友富的建议,对龙的形象新包装,充其量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而已。

想要中国资本市场提高国际地位,不能忘记文化的作用。仅仅强调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肯定是不全面的。国际上已经有了,你再重复建设,充其量也只能以规模取胜而已。中国目前取得的经济成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结的硕果。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扩大,最终要依赖自身独有的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参与主体,整体上由国有资本控股。在境内市场,我们让上市公司统一面值、会计年度等,均可看作资本市场中的中国文化。现在有一些人,一谈到国有控股就摇头。但从H股影响与日俱增看,境外投资者完全能够接受中国的经济文化。笔者相信,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作用,其中包括传统文明的精髓。